

致敬 抗战老兵
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

指挥部下打落敌机

访马屿抗战老兵陈发源

记者 项乐茹 实习生 蔡如祥

“我有什么德何能，让你们来采访我。”在马屿镇梅屿社区马中村的老年人活动室，抗战老兵陈发源握着记者的手说。96岁高龄的他，步伐稳健，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70多年前，22岁的陈发源加入瑞安县抗日自卫大队，曾率部下用步枪打落日军飞机。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，他道出抗日往事。



指挥部下用步枪打落日军飞机

70多年前,22岁的陈发源还在读书时被抓壮丁,被同乡的国民党军官保出来后考入兵役干部培训班学习。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”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,我们怎能忍。”面对日军不断的侵入,陈发源加入当时的瑞安县抗日自卫大队,并担任一个中队的班长,主要驻扎瑞安天玉寺一带训练。

“当时我们的装备和日军相比差距太大，他们用的是大炮、机枪，我们只有步枪、手榴弹，因此就采取了类似‘打游击’的方式，不跟日本人正面交锋。”陈发源说，当时他们的策略是“敌进我退、敌驻我扰、敌退我追”，曾经三次和日寇作战，日军从温州方向和沿海侵占瑞安，他们就用步枪抵抗，但常常

为避打内战主动退役

“日寇实在是太可恶，坏事都干尽了。”陈发源说，为打日寇他们到处辗转奔袭，即使下着大雨也要连夜反攻日军，时常一天只能吃两顿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他看到日军在瑞安县城里为非作歹，抢占老百姓的家当，把东西堵在路中间挡我方部队，甚至强奸欺侮老少妇孺，这让他恨不得拿真刀真枪和日寇正面交锋。后来，他还在地方当过乡队务，主要训练民兵及时补充自卫队后备力量。

日本投降后,陈发源考入了中央警官学校第五分校,学习一年多毕业后分配到沈阳警察局工作。然而1946年,内战爆发,他坚决不参加,便又辗转回

没打上几枪,就只能先撤退,分别撤退到湖岭潮基、高楼平阳坑等地。

即使装备实力悬殊,但自卫队也依然顽强抵抗日寇,甚至用几把步枪,就把敌军飞机给打落下来。陈发源记得,日军当时派来好几架飞机,想要投炸弹到瑞安西门一带。

“可能是日军轻敌，飞机都飞得很低，在空中往地面投炸弹。”陈发源说，他们看飞机飞得低，就让3名士兵用三支步枪朝飞机连续射击，果真打中了其中一架敌机，飞机直接掉到了东山一带的滩涂里。“大家都很开心，后来我们班的士兵还受到上级部队和当时县长的嘉奖，披上了红绶带。”他说。

到了家乡马屿，他到当地的环山小学教了两年书。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打内战的时候我就回家教书了！”陈发源重复了多次。

1949年初,陈发源因某种原因去了台湾,被分配在台北警察局做督察员。1950年4月份,因为大陆已经解放且思念家人,包括陈发源在内,还有几个在台湾做生意的瑞安人,每人出了二两黄金集资买了一艘船。“当时海关都有哨兵放哨,他们就利用我的警察身份,找了个巡视的由头,通过了检查,一行人将船驶向金门,最终跑回大陆,回到了家乡。”他说。

改名当兵参加抗日

访陶山抗战老兵单啸梅

记者 缪星象 实习生 谢声远

单三梅老人现在住在陶山镇陶峰村老年公寓。96岁的他不戴老花镜，不拄拐杖，上下三楼都不用人搀扶。当着记者的面，他翻开珍藏的丙戌年(1946年)族谱，上面有他的一行字：啸梅最小亦任陆军三十三师师部军需长。

“嘯梅就是三梅，三梅就是嘯梅，”老人说，这两个名字，和他的抗日岁月紧紧结合在一起。



赶马车运弹药战斗在瓯江口

单啸梅家中排行老三，老家在陶山沙河村（现为向荣村），“三梅”的意思就是家中第三个小孩。十几岁的时候，家里培养他读完了高小，在当时的农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。毕业后他回家务农，种田为生。1939年农历11月，温州抽壮丁征兵，单家三兄弟必须去一个。单啸梅当时19岁，年轻有活力，被抽中了。

第二年农历正月,他正式入伍,填名字的时候,他觉得“三梅”这个名字太土,自己用了谐音“啸梅”。年轻气盛的他,想闯一番事业。

单啸梅加入的是浙江省抗日自卫纵队第二大队六中队,整个中队150多人,营房设在温州状元桥茅竹岭右首山脚下的娘娘宫里。另外还有四中队、五中队,均驻扎在附近不远,扼守瓯江入海口。单啸梅是六中队唯一一名高小

毕业的,能写会算的他没多久就被升为上士军需官,管理整个中队的武器分发。因为队里没有医务兵,他还要学习怎么消毒、包扎伤口、运送伤兵等。

他回忆说,当时武器装备挺差,一个中队最强的武器就是3挺机枪,炮一门都没有,平时训练舍不得用子弹,实弹射击少得可怜。不过大队长曾可法想办法弥补这些缺陷,布置了大量的沙袋、挖掘战壕巩固滩头阵地。

单啸梅经历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41年初,在龙湾永强,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。据他回忆,当时天快亮了,日军的汽轮开到瓯江口附近,炮击守军阵地。3支中队共500多人立即集合,在炮火中向阵地进发。单啸梅给每人分配了50发子弹,两颗手榴弹,随后赶着一辆马车跟在部队后面,车上除了整箱的弹药外还有担架、绷带、消毒用的红汞等。

抗战结束解甲归田

“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，船开得很近，我们集中全部的九挺机枪打日军的船，让他们没办法登陆。”单啸梅说，当时日军的火力虽猛，但沙袋和战壕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。一位陶山的士兵被炸伤，我赶紧过去包扎伤口，还有一位仙降的士兵，名叫苏志芳，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腰部。“他大叫一声，我们以为他没命了，结果发现子弹打在了他腰部的子弹带上，凑巧被一枚铜质的假银元挡住了。”

“那枚假银元怎么来的呢，是前些时间苏志芳逛街，看到两名老太太在吵架，大概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位老太太借给另一个人一枚银元，还回来的时候发现是假的。苏志芳估计是老太太拿银元买东西时被人调包了，就借着帮忙看看真假，用自己的一枚真银元换了下来。这枚假银元就一直别在子弹带上。”单啸梅说，之前还有人说苏志芳太傻，现在看来，真是好人有好报。

单啸梅说,因为御敌有功,两年后大队长曾可法上调到当时的陆军第三十三师师部,他也升任第三十三师的军需官,军衔是少尉,师部驻地在丽水。当年修族谱,他的职位也被写入其中,此后他一直任后方做后勤工作,没有机会直接上战场杀敌。

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全师接到命令要往金华调动，没有车，全部是徒步走。单啸梅随曾可法一路行军，到了遂昌时，曾可法发起高烧，军医说是急性脑膜炎，部队也没有特效药。单啸梅找遍遂昌，只找到一名当地医生，开了三服药，才吃了两服，曾可法就病故了。

“我带着曾可法的遗体回到他碧山老家，这时候部队已去金华了。我想想日本鬼子也投降了，仗也打完了，就写了封信给师部，退伍还乡了。”单啸梅说，回家后，没人再用“啸梅”称呼他，战争已经过去了，他继续种地，回到了原来的“三姆”。

[后记]

单啸梅老人解放后曾当过老师,做扫盲工作。他有3个儿子,衣食无忧,身体安康,九十六岁仍能生活自理。解放后,五六十年时间他用的都是“单三姆”这个名字,近年来,随着纪念抗战胜利工作的不断深入,相关部门逢年过节常上门慰问,“单啸梅”这个名字,又重新被人们记起。

[后记]

从台湾回到家乡后,陈发源做过粮仓保管员,也去过农场劳动。如今他身体健朗,育有9个子女,有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,目前和二儿子住在马中村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里,生活还算安康。从22岁到26岁,4年的抗战经历,显然已成为老人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。8月12日,在记者探访老人的时候,还看到房间里挂着他今年春天题下的诗,上面写有:国共两党四亿众,驱逐倭寇民安康。抗战胜利七十年,锦绣河山更辉煌。

